

金門研究專輯導讀

林正珍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本期「金門研究專輯」共收錄了三篇研究論文及二篇田野調查與史料介紹，這些著作除再現了金門過往的重要歷史記憶之外，更呈顯了部份金門歷史文化的特質。由於金門位居中國海疆邊陲，彈丸之地，維生條件不易，歷史上常受東南海域局勢變遷影響，明清以來，朝廷也多將金門視為是兵防重地，而自明代以來，科舉功名鼎盛、宗族文化形成了金門的特質。在大時代的變動下，兵災及遷徙，交織譜成了金門獨特的集體記憶，特別是大航海時代以來，金門人向外移民，遍及日本及東南亞，形成非常特殊的僑鄉文化與海外華人特質。本專輯幾篇文章剛好極具代表性，呈顯這樣的金門。

李宗翰教授〈鄉里間的書院：清代金門浯江書院之設立與運作〉一文敘述了浯江書院自雍正 13 年至光緒 30 年（1735～1904）經費運作如何由義學、學田和商業模式的變遷歷程；此外，更藉由這一鄉里間的書院，探討傳統地方權力運作的方式，特別是縣級以下的鄉村社會，在地方公共事務的參與上，擁有底層功名的監生及具財力的地方菁英，如何介入公共事務，參與運作，特別是文教方面，而鄉紳及地方菁英，經由書院的網絡，也擴展其社會網絡，如興泉永道的力量被引入書院建設，除書院資源外，也可藉此建立自身與地方官員的聯繫。這項案例為最基層的鄉村社會的權力運作，作了最好的示範，李文並指出，浯江書院在道光元年（1821）後獲得較穩定的收入方式，使書院得以長期維持穩定運作；其中關鍵，在於捨棄原有購田收租方式，改採貸款予商人以及收取店租的商業經營模式。像浯江書院這種以商業為主的經營策略，自 18 世紀中期以後即開始逐漸在中國不同地區流行，顯然是與各地商業經濟發展程度有關，這歷史變化趨勢，反映了當時地方社會上新的社會、經濟與權力結構。整體而言，此文除以底層視野敘述地方菁英如何創生與掌握文化資本的一個面向之外，更是一篇以小歷史見證大時代脈絡的文章。

張志相及李建緯教授合著的〈光宗耀祖：金門瓊林宗祠內科舉功名與頌

德匾研究》一文，以金門瓊林聚落七座八祠內的科舉功名與頌德匾作為研究對象，除以工藝、書法風格等方方面面，考證這批科舉功名匾的可能年代與版本問題之外，並由殘存文獻中的明清科舉功名匾及其經費來源，交互考證功名匾上的人名、匾額相關名詞，並針對特定匾額釋文及論述其歷史意涵。此外，論文最可貴的是，有關匾額重複性問題的討論，作者經由說明匾額再生產（重製、新製、修繕）提醒研究者不能只停留在判斷真偽層次，而需深入匾額再生產背後所蘊含的社會、文化因素。金門瓊林蔡氏宗族以科舉功名，興家於明代中晚期，宗族也充分利用了因科舉制擴展所帶來的各種成效。就旗匾而言，宗族對內可作為團結族人認同的象徵與工具；對外，豎旗、懸匾、建牌坊更是一種社會行動，不僅榮耀自身，使宗族組織得以擴展，並與他族區隔。新方法和新材料的運用，豐富了瓊林蔡氏的宗族史的敘事面向，而對「物證」更由辨真偽，進一步窮究其「如何偽」及「何以偽」更深層的人性及社會意涵。

江柏煒教授〈近代金門的移民網絡及僑鄉社會的文化景觀〉一文，敘述 19 至 20 世紀中葉，金門跨境移民網絡如何形成，及僑匯經濟如何型塑僑鄉文化。作者認為僑匯民居及祠廟是「散居共同體」（diasporic community）的華僑家族社會實踐的具體象徵，而 1910-30 年代金門大量出現的洋樓建築，則是跨地區異質文化形式上的建築移植，轉化殖民建築及閩南傳統建築風格所產生的一種文化混雜體，源自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卻轉化成具地域特色的「混雜現代性」（hybrid modernity）。洋樓成為一種文化資本，具備現代性象徵，同時樹立了權威的社會效果。此外，在那個年代，致富海外的金僑，各依其海外所見和故國世局，關切家鄉的教育、政治、實業、公衛、環境等，這些建言與作為，均可用於探究金僑對於僑鄉社會作為現代性想像與實踐。最後，作者指出近代金門歷經了一種早期「全球在地化」（globalization）變遷，而這些混雜現代性論述，則是一種「主動性的學舌」（an active mimicry），由於各自漂浮在異地、異文化表象，難以存續，易

隨時局變遷而不濟。顯然作者是試圖藉由說明僑鄉社會的文化形貌，以之定位金門文化景觀的價值。

除上述三篇研究論文外，專輯也刊載烈嶼（小金門）第一代移民新加坡的墓碑碑銘文獻，和烈嶼林天助先生的口訪。前者對金門海外移民史，提供了新材料，而後者詳細描繪出邊陲島嶼對外交通的貿易形態、物資內容和貨物進出流向，這些資料均提供了一手視野，有利學界後續研究。

呂世聰和林建育先生的〈新加坡發現的金門烈嶼第一代移民墓碑碑銘文獻：兼談武吉布朗公塚遷葬影響的金僑墓葬〉一文，是作者多年來走訪新加坡各華人義山，而整理出的金僑墓碑碑銘文獻的田野資料。新加坡是金門人移民人數眾多的地區，2011年新加坡政府為建高速公路，遷葬武吉布朗公塚，在10萬墓塚中共4千多座墓塚受影響，其中311個是金門先人，作者並在新恒山亭遷葬墓群中，發現約十方金僑的遷葬墓碑，其下葬年款介於道光至咸豐年間，主要是來自烈嶼的鄉僑，最早的墓主下葬年代為道光29年（1849），這也是目前新加坡所發現最早的金僑墓葬，較《浯江孚濟廟碑記》（1876）所記載落番時間要早。這批墓碑文獻，為研究早年南來新加坡的金門鄉僑歷史，提供了無比珍貴的實物例證與文獻資料。這些現存可觀的金門墓塚，若能結合族譜或口述歷史，當可為金門移民史再添新說。

林玉茹教授的〈1920-1930年代烈嶼與福建的商船貿易活動：林天助先生訪問紀錄〉一文，是1937年日據金門前，在烈嶼實際經營商船貿易的林天助先生的口訪紀錄。口述資料再現了烈嶼地區在日據金門前，當地以小型各類船隻往來貨物載運情形，除船隻規模、形式及各項成本外，更由其親身經歷，具體敘說烈嶼和福建周邊地區，如大金門、石碼、廈門，經由船隻往來的商貨進出狀況，而臺灣不在小型經濟圈範圍內。顯然日人據金之前，烈嶼依舊維持清代傳統中式帆船貿易活動，某種程度地展現島嶼對外交通的貿易形態，提供了可貴的傳統船隻活動資料，得以補充文獻研究上之不足。